

## 法 比 奥 · 穆 西

### 3 共产党对法西斯主义的看法

乌尔班 按照苏联的标准解释，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为镇压工人阶级和社会上一切进步分子的抵抗而建立的一种最反动的、公开实行恐怖手段的金融资本的专政形式”。这是《简明哲学词典》中下的定义，并在最近的苏联文献中原封未动地保留下来。伦齐奥·德费利切著作中对法西斯主义的描绘同这种解释不一样。我想，贵党与德费利切的分析也不一样。简单地归纳一下德费利切的分析。他说，法西斯主义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它继承了法国革命的某些“进步”特点以及早期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血统；它不是依靠面临经济和社会崩溃的小资产阶级，而是依靠繁荣上升的阶级而获得胜利的；法西斯主义在许多方面是不能同国家社会主义相比的。在这些问题上贵党看法怎样？

穆西 近年来，研究法西斯主义的人数大有增加。我们也在重新考虑我们先前的分析所得出的一些结论，这些判断由于考虑不周而变得陈旧了。当然，我们关心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并不是什么引人注目的新鲜事。整个二十年代，我们党和共产国际都花了大量时间来分析这种现象的确切性质，但是，那段时期的解释在许多方面都是错误的。例如，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前，人们公认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的痛苦挣扎，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实际上加速了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与此相联的还有另一个错误，即认为某些事实上接近共产党的党派和运动，比法西斯类型的真正的反动党派对共产党的危险更大，因为担心这些非共产党左翼力量可能冲淡共产主义的革命性质，而法西斯主义属于敌人一方则（被认为）是一目了然的。

乌尔班 你是指斯大林对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

穆西 不只是这一点；我还指我们作为一个党，在法西斯主义的晚期对待非共产党的秘密党派——例如社会党——的态度，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些党是我们的主要对手。这是共产国际的立



场，而我们毫无批判地接受了它。

在对法西斯主义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时，必须把它的这样两个方面联系起来：它既是一个阶级现象，又是一个政治现象。对我来说，这一点是明确的，而且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是明确的了。我们最初犯的错误是，认为这个政权从政治上说只是建立在恐怖之上，从阶级观点来看，法西斯主义（正如我刚刚说过的）是资本主义在向社会主义革命投降之前的垂死挣扎行动。

同时，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在所有参加共产国际的党中，意大利共产党是首先提出修正对法西斯主义的这种解释的党之一。葛兰西在其《狱中笔记》中写道，法西斯主义当然是一种独裁，不过这种独裁也体现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国家、文明社会、一个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一个政党，等等。换句话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不是用一句简单口号就能恰如其份地表达清楚的。陶里亚蒂一九三五年在莫斯科发表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演讲中，也把法西斯主义描述为一种群众性的反动政权——反革命固然是反革命的，但却是一个赢得了广大群众支持的政权——

乌尔班 ——包括工人阶级的支持？

穆西 是的，包括这种支持。工人不支持它又有什么办法呢？由于这个政权的疯狂镇压，社会党实际上已不存在，因而也就迅速地同那些直到二十年代以前一直支持它的阶级失去了联系。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干部遭到逮捕，党已不能发挥作用了。诚然，我们党的一些领导人曾设法于一九三四年在科隆举行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当时党还有两、三千名党员的基本力量。换句话说，党在进行抵抗，尽管它已变为少数，尤其是在北部的一些工业区。

工人运动何以遭到这样严重的破坏呢？这就是共产党重新评价法西斯主义的出发点；这也是使我们围绕伦齐奥·德费利切的分析展开辩论的缘由。德费利切在他的墨索里尼传以及他接见迈克尔·莱丁的《会见记》中，差不多把意见一致这个因素看作是法西斯主义政权的唯一决定因素，而忽略了决定其真正性质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的因素。这就是我们同德费利切发生争论的主要原因。

乌尔班 阿诺德·托因比曾写道，共产主义是走了样的基督教。人们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难



道不可以说法西斯主义是走了样的共产主义吗？我觉得德费利切就是这个意思。

穆西 不是。德费利切犯了一个独出心裁的错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因为他引用了所谓“早期法西斯分子”，即第一批法西斯分子（他们主要是些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讲话和文件，并按这些人提出的纲领来描述法西斯主义的性质。这些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党人数目不多。他们于一九一九年同墨索里尼及其他人一道建立了法西斯党。他们的政治词汇同当时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的语言一致，这并不奇怪，因为事实上他们中有些人就是属于这些运动的。

乌尔班 你指的是马里内蒂及其他传播“圣人无产阶级”福音的未来主义者——即那些颂扬战争是“扫除世界污垢的唯一手段”的人吧？

穆西 是的。这是一场相当有影响的文艺复兴运动。多年来，很难说它在政治上走的是什么道路。最后，它的一些主要成员参加到法西斯主义运动中去了一

乌尔班 ——但是，其他一些成员成了共产党人——

穆西——很少。这个乌托邦文化艺术先锋队（它荒诞地企图以艺术的名义来掩盖历史）之所以不受欢迎、现实主义之所以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们中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太少大概是一个原因。

德费利切为了证明他的理论而被迫利用了他的一些材料。他掩盖了法西斯主义政权直到一九二八年前后的暴力活动，或者只是对这些活动作一点轻描淡写。如你所知，建立法西斯主义的道路是以逮捕、酷刑和暗杀铺平的。在德费利切的著作中，“早期法西斯主义”占主导地位，并被武断地同法西斯主义历史的主要部分割裂开来了，尽管人们在编写历史时明确地承认，这个“社会主义”阶段的早期法西斯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运动只存在了几个月。正式建党后，法西斯主义几乎立即被波河流域的大地主和北方工业家接了过去。在这件事上，每一点都是有案可查的：谁为什么事提供了什么资金，钱是怎么转手的，人是怎么被收买的等等。事实是，不出几个月，这个运动就成了一个性质截然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工具。

马尔班 不过，你肯定会同意墨索里尼曾是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党人，《前进报》的



主编——一位博得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尊敬的人物吧？有些给人印象很深的话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如葛兰西称处在社会党人阶段的墨索里尼是“我们的领袖”；列宁责备一个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团说：“墨索里尼？他不能同我们站在一边，是一大憾事！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物，他本来是会指引我们党走向胜利的”；托洛茨基也对这个代表团说：“你们失掉了王牌，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唯一人物就是墨索里尼”；陶里亚蒂说：“不要忘记，墨索里尼曾是一位社会党领袖”。阿尔贝托·阿夸罗内教授援引一九三一年的一份非同寻常的警方报告说：“领袖（指墨索里尼）今天在工人阶级中比在资产阶级中更得人心……资产阶级抱怨说，‘墨索里尼在缓慢地、惬意地、默不作声地朝着实现一种布尔什维主义的方向前进’。”（顺便说一句，难道能够设想，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份秘密报告会警告斯大林的政治局：在苏维埃社会的一些阶层看来，斯大林正在走向法西斯主义吗？）

不仅如此，法西斯分子和共产党人之间有某种个人往来，最有代表性的是象波尔迪加、坎蒂莫里、本巴奇、拉布里奥拉和马拉帕太（这里提

到的只是最有名的人)这样一些人的朝秦暮楚。这背后想必有某种比好走极端的性格产生的摇摆行动更为深刻的东西,要么就是把法西斯主义错当成社会主义或者是把社会主义错当成法西斯主义了吧?

穆西 我觉得这种论点是不可理解的,无论是你提出的还是德费利切提出的。在罗斯福新政派(他们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世界经济萧条后操纵了美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中,就有一批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背景的人,其中包括一些正统的共产党人,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在“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居住过。人们能因此就说新政是马克思主义的派生物吗?或者回过头来再谈意大利吧,在一九二五年以前一直明确支持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的学者和政治家中有许多人在政治上属于自由派人物。他们中包括众院的很大一部分自由派议员。这些人认为法西斯主义是阻止社会主义前进的一个便当工具。我们能因此就说法西斯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派生物吗?政权就是政权。它们不取决于少数成为政权领导人和支持者的履历。

乌尔班 看来你是说,你既不接受苏联为法



西斯主义下的标准定义，也不同意德费利切为法西斯主义下的定义。你是介乎这两者之间。

穆西 是的。我们现在正是处于这样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状况。不仅是在我们给法西斯主义下的定义方面是这样，而且在我们党过去几年里在欧洲共产主义范围里采取的整个立场方面也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只谈法西斯主义吧：德费利切对墨索里尼的钦佩把他搞得有点晕头转向了。至少说，这是一种我们不能同意的、不从历史角度来研究历史的做法。自由派把法西斯主义解释为一种历史偶然事件，例如克罗切著作中的解释就是这样。这在我们看来，又是另一种过分简单化的做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接受苏联的看法，即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直接结果和顶峰。

乌尔班 但是，俄国人不是说得比这更进一步吗？他们说，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及现在所称的“苏黎世妖魔”对米兰的诚实工人实行的公开的恐怖专制。

穆西 当然，俄国人说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残忍、嗜血的东西，这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意大利共产党并不认为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任何

部分注定要走法西斯主义道路。我们倒是认为，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某些责任必须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政策来承担。

乌尔班 你说按照自由派的解释，法西斯主义是历史上的一个偶然事件。如果人们确实这样认为（我不能肯定是这样），那么对法西斯主义的支持可就明确而有力得令人吃惊了。一九二四年七月十日，即马泰奥蒂被暗杀之后一个月，正当法西斯主义处于低潮、墨索里尼看来很有可能垮台的时候，贝尼德托·克罗切用这样一些话对参院投票支持墨索里尼表示赞同：

我们不能指望、甚至不能希望法西斯主义突然垮台。它既不是什么迷人的东西，也不是恶作剧。它满足了一些重大的需要，做了很多好事，正如每个公正的人必须承认的那样。它在全国的一片掌声和赞同声中前进。因此，一方面，人们希望维护法西斯主义带来的好处，而不要回复到在它之前的那种压榨殆尽、走投无路的状况；另一方面，人们也感到，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利益——即使是一些不那么值得称道、好处也不那么大



的利益——是一个不能抹煞的现实。因此，我们必须使法西斯主义有时间完成它的转变进程。这就是参院作出谨慎而具有爱国精神的表决的原因。

这在我听起来象一个确证，证明克罗切的评价是，法西斯主义的到来既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不受欢迎的。

穆西：克罗切这种错误判断只维持了很短时间，它是自由主义运动领导人所共有的一种错觉。一九二九年一月颁布的取消一切政治自由的法律也打开了这批人的眼界。克罗切是一位坚决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这是毋庸置疑的。他在那不勒斯的住宅甚至遭到法西斯分子的破坏。然而，你说得不错，他曾抱有你上面讲的那种看法。但是，要是对自由党人苛刻一些的话，我还可以使他们更加难堪地举出乔治·阿门多拉的父亲、自由党领袖乔瓦尼·阿门多拉的例子。他是那些认为并且讲过不应用武力来反对向罗马进军，因为法西斯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起了有益的平衡作用的人之一。但是，他后来却成为最先提出同法西斯主义决裂的人之一，最后死于法西斯分子手中。

乌尔班 可是克罗切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因为他讲过的许多话同那些想看到共产党今天能在意大利执政的人现在所说的如出一辙：意大利现在混乱不堪、执政党优柔寡断、宗派林立、腐化堕落。因此，法西斯主义的单一思想的统治一度是受欢迎的，因为它能实施法律和秩序，使国家重新振作起来。我本来想这也是你们呼吁公众支持的理论基础，或者至少是你们的呼吁的这一面会使共产党上台或分享权力。你说这种论点是正确的吗？

穆西 不，这是不正确的。如果真是这样，我就要离开这个党。我为之工作的党的理论基础同法西斯主义毫无相似之处。正如大家都承认的，意大利需要新的社会秩序。我为这个党工作的全部理由，就是要使这种新秩序在大家获得最大自由、工人阶级得到解放的情况下建立起来，而不是通过不给自由和通过独裁建立起来。

乌尔班 我看列宁未必会同意你的看法，尽管马克思可能同意。列宁说，自由是资产阶级偏见。你愿称自己是列宁主义者吗？

穆西 我宁愿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我还要补充一句，我也是葛兰西主义者和陶里亚蒂



主义者。我认为列宁主义是在特定情况下的一个伟大的历史成就，不过这是只能联系俄国现实加以衡量的成就。那么，我现在很愿意避开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不谈——

乌尔班 ——这可就要把苏联历史砍掉一半——

穆西 ——对，是要砍掉一半。

乌尔班 这些看法代表意大利共产党的官方思想吗？

穆西 是的，是代表官方思想。我谈的这些论点是公开发表过的，也是我们一九七七年一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讨论过的。在那次会议上，贝林格痛斥了东欧最近的一些不给自由——不仅是不给知识分子自由——的事例。在谈到意大利危机时，他从我们严重的国内局势和石油生产国的压力这两个角度说明了为什么必须在经济上实行节约。但是，这种节约办法（他说）是调整我们的制度和在公正、平等的基础上改组意大利社会的一个机会。然而，由一个党来承担这么重大的任务是免不了会出现极权主义危险的——

乌尔班 ——你的意思是说，大旗上写着自由和多元论的共产党也害怕在关键的情况下会重

现过去的那种可怕局面吗？

穆西 在象目前这样的危机时期，任何一个企图按照自己的想像改造社会的党，必然会冒强制实行自己的政策而排斥其他政策的风险。例如，天民党人多年来就是这样做的。

乌尔班 但是，你说的是，共产党也会不知不觉地干起这样的事情来，尽管这是违背它自己的明智的判断的。

穆西 是有重复天民党的做法——把招牌换一下——的危险。天民党人把其权力建立在歧视共产党的基础上，不仅在组阁方面，而且在意大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行政、社会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是如此。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属于一成不变的天民党思想体系的社会，也就是一个建立在个人和经济利益集团统治基础上的社会。这就是我们意大利目前发生麻烦的原因之一。共产党完全不同于天民党。不同之处在于，它不维护任何集团的利益。尽管如此，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能呼吁各个政党、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给予合作，那就比我们单独挑起这副担子更容易解决这个危机。

乌尔班 看来你是对你们自己的左翼的态度



感到忧虑。

穆西 根本不是——

乌尔班 ——一旦你们执政，你们的左翼会怎么样？

穆西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我担心的倒是，一个象今天的意大利这样的政治上分化得很厉害的国家，可能在压力之下一分为二，进入无可挽回的对抗状态。要记住，意大利的现状不是政治进程运转正常、各政党轮流执政，而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乌尔班 我不敢说意大利局势有过“正常”的时候。

穆西 在这一点上，你也许是正确的——很难回想起近二百年来有过正常局势。

乌尔班 我在罗马听说，当然主要是对贵党不抱善意的人说的，现在是鼓励共产党组织政府的时候了，不过要让它单独组阁。就凭意大利现在这种混乱局面，共产党不久就会丧失信誉，因为共产党也同天民党一样不可能解决意大利根深蒂固的麻烦。我认识到，由于你上面谈到的理由，你们的雄心并不是要单独执政。但是，如果你们满足于同包括天民党在内的其他一些党分享权

力，那你们就会冒另一种危险，同样具有毁灭性的危险——遭到你们盟友的损害和被他们打垮。

▲ 我想起墨索里尼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即萨洛共和国成立不久后讲的一段痛心的话（我也给伦齐奥·德费利切引述过这段话）。他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未能按照其原来的社会主义意愿办事，因为这个国家是由“两头政治”统治的——革命的法西斯优秀分子的政策受到一批君主制保护的保守势力的阻挠。他说，意大利实际上是由两个政府统治着，法西斯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实质被削弱并最终被挫败了。如果意大利共产党加入一个它显然不能完全控制的联合政府，它就有可能遭到同样的下场，你对此不感到担心吗？

在我看来，共产党无论是单独执政还是作为联合政府的一个伙伴都会遇到麻烦。因此，重新执行一项坚决充当反对党的政策，等待较顺利的条件进行战斗，不是对意共最有利吗？

▲ 穆西 我愿意认为你提出的是无偏见的劝告……你所说的无疑有些对的地方。当然，我们可以继续充当反对党，把我们的赌注押在危机的加剧上，而且事实上是以自己的行动加剧危机，希望处处以反对党的姿态行事，以便赢得选票和文



持。

但是，这种做法同我们要去听从那些要我们单独执政的高见一样肯定会使意大利遭到毁灭。贝林格在我们一月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致闭幕词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一段话。马克思的这段话说：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有时只能以双方的同归于尽来解决问题——在历史上的这种时刻必须作妥协。我们意大利现在就是这种时刻。

乌尔班 我不相信莫斯科在这点上会同意你的看法。

穆西 它不会——它也不会同意我们说的许多别的事情。但莫斯科的观点是它的事，不是我们的事。

至于你的第二个论点：一九四三年，墨索里尼不得不为法西斯主义的失败找一个替罪羊；推卸自己的计划失败的责任在历史上是一种标准做法。当然，我们在努力预见我们作为联合政府的成员能怎样有效地使我们的政策得以实施，而且我们也仔细地权衡了你提到的那种反面的可能性。同时，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我们周围到处都有我们可以与之合作的进步和民主的力量。同墨索

里尼不一样，我们并不把世界一分为二：存在于这个运动中的善和存在于现体制和意大利各项制度中的恶。例如，教会最近采取了一个重要的主动行动，召开了一次关于宣讲福音和如何使人的品格更加高尚的会议。这就不再是那种陈腐的保守主义的态度，而是乐意进行强调社会改革的公开对话了。还可以研究一下意大利宪法的性质。这部宪法是几个党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能把它说成是其中某一个党战胜其他党的象征。然而这一联合事业——“联合”产生的这一书面结果——没有使意大利毁灭，而且我们非常可能是处在不断地重新解释宪法的另一阶段的前夕。换句话说，联合、合作和妥协都是可能的，我们打算使这些东西起作用。

乌尔班 我明知这样问不好，可是还要再说一遍——莫斯科的保守派对所有这一切会作出什么反应呢？我的猜测是，你们会受到谴责，先是被说成改良派和社会民主派，最后被说成法西斯分子。

穆西 让他们谴责好了。但要记住，我们关心的不只是莫斯科的保守势力的反应，我们对进步的共产党人怎么想和怎么做也同样关心。



乌尔班 你的意思是说苏联也有这样的人。

穆西 显然是有的。我们坚信，欧洲共产主义存在的本身将加强他们的力量，鼓励他们改变某些陈腐、刻板的态度，纠正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弊病。

乌尔班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莫斯科的确存在这种进步力量？

穆西 我们认为，一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经历就足以证明，自我纠正的可能性在东欧是确实存在的。

乌尔班 我对于从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潜力来推断苏联也有类似机会还没有把握。

穆西 莫斯科对捷克斯洛伐克走民主和自由的道路作出的激烈反应，表明它害怕布拉格的变化会使整个东欧被压抑的民主愿望迸发出来。

乌尔班 确切地说，你是说布拉格之所以受到苏联集团的保守派的镇压，是因为他们感到在他们自己队伍中存在象布拉格那样的不满的种子？

穆西 这正是我的论点。人们习惯称苏联社会是坚如磐石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仍是实际情况。但是，苏联社会正在向不同的方向开放，这也

是实际情况，而且情况越来越是这样。只有在考虑到苏联不再是一个农民社会，而是一个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及生活方式在过去三十年里大大提高了的社会时，才会估计到出现这种情况。白领工作人员，即懂技术或不懂技术的知识分子的队伍扩大了。在意大利，我们毫不怀疑，那种参与以先进的技术文明来解决问题的活动的才智不会停留在计划之中，而迟早会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显露锋芒。换句话说，它势必会施加要求政治自由化的压力。我们政策的全部意义就是要表明，社会主义本身就具有沿着一条不同于俄国的道路发展的能力。我觉得，《七七宪章》的签名者明确提到意大利共产党的例子，这不仅使人高兴，而且意义也很重大。

乌尔班 卢乔·伦巴多·拉迪切最近在接见《新闻报》记者时说，现在是不仅批评个别事件，而且要对东欧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提出原则批评的时候了。

穆西 应该这样做，我们也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入侵之后，我们党举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时，贝林格明确表示，不受限制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也应用于社会主义



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最近在批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时，已明白地宣称，这个问题的根子是结构性的：从孤立事件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理解或正确理解的，而只有作为整个党和国家制度的弊病的一部分才能正确理解它。《团结报》上发表的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已引起热烈的讨论，意大利的一些重要的共产党知识分子是支持《七七宪章》以及东欧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宣言的。因为我们呆在《再生》周刊的编辑室里，我还可以补充一点：我本人已为明天的报纸写了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文章。

乌尔班 你能给我扼要地概述一下这篇文章吗？

穆西 这篇文章谈的是知识分子的自由和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问题。不过我提出的真正论点是，知识分子自由不能同作为自由本身的自由（即给予每个人的、无条件的自由）分开，就是说，不能同民主分开。人们也不能满足于说存在一致意见，因为这种一致意见无论是想象的还是实际存在的，仍然意味着对不同意见，不仅是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而且是工人、妇女、青年，

实际上是每个不在对一致意见所下的某种常常是武断的定义范围之内的人的不同意见。更重要的是，我强调指出，民主和自由的问题并不是只关系到意大利式的共产党人的事情，它同无论何处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都有关系。

乌尔班 是一个教会分立声明（如果有过这样的声明的话），是路德派或加尔文派对罗马提出的具有下述神学分歧的挑战：在人的意志自由的问题上，路德派和加尔文派荒谬地否认意志自由，而天主教学说则说存在这种自由。

穆西 我们是否实际上在提出这样一种挑战还要以后再看，不过你的比拟并非完全不合适。

乌尔班 是“多中心主义”在创造这个词的国家内和党内发展的更高阶段吗？

穆西 你这显然是指陶里亚蒂。但它的根子要追溯到比陶里亚蒂早得多的时候。葛兰西的《狱中笔记》业已包含某些非正统思想，从而使他被拒之于第三国际的意识形态范围之外。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间，陶里亚蒂提出了走意大利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一个新型的共产党的主张。随后，在一九五六年镇压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又提出了多中心主义的概念。因此，我们的



自主精神和独创性不是近期才有的，而要追溯到建党之初。

乌尔班 我依然不十分清楚，如果你把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国条件下的特有产物抛弃了，那末共产主义的革命秘诀又怎能保留下来。列宁坚持认为，革命的开路先锋是团结在一个组织严密、把革命带给尚未认识到历史不可避免的意志的工人阶级的党内的一批谋士。如果你放弃这个观点，那么共产党、任何共产党还有什么合法性可言呢？我们知道，马克思并无组织一个党的意图——更谈不上一党制的国家了——而且他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也不赞同。

但是我不认为你们的日常宣传中已经取消了列宁主义。今天早晨，当我从威尼斯宫方向走向贵党总部时，我看到所有的墙上都张贴着共产党的宣传画，画的是正在进行革命的彼得格勒工人簇拥着英雄般的列宁。

穆西 对不起，你是不会在我们的宣传画上看到列宁的。你所见到的宣传画是极端主义组织的作品，而不是共产党的作品。

乌尔班 我觉得，你们所要的是社会主义的

目标，而不是它的手段。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社会主义这三者中，我认为列宁主义是最重要的工具。没有它，任何共产党都不能上台或保持政权。

穆西 我不同意只能依据所谓的社会主义创始人们的经典来证明社会主义将来的发展的合法性。这是一种中世纪式的方法论，对此我们不赞成。我们不是牧师，我们不乞灵于神圣的经文。在整个现代史，包括社会主义历史中，政治运动的发起者们生前从来没有在他们的名字后面加上什么“主义”。这种受人崇拜的地位是在他们身后确立的。例如：当今我们贴上“列宁主义”标签的东西有一部分是从列宁那里来的，但是它也吸收了斯大林的很多东西。从一个客观的史学观点来看，这是对列宁主义的严重曲解。在意大利，我们已经开始试图把作为政治理论家的列宁和作为革命领袖的列宁区别开来。我们这样做就是在摆脱围绕列宁个人建立起来的、并传给了我们的那种宗教意识的束缚。

乌尔班 我同有见地的意大利自由派共产党人和从前的共产党人谈过话。他们强烈地认为，若是去掉共产主义的神秘色彩，就势必毁灭这个



运动。如果你们批判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共产主义还剩下什么东西不可以在社会民主之类的其他名义下向前推进呢？那样障碍会少得多。

穆西 一个政治运动的历史不象一件行李，当情况需要时，就把它扛在肩上，而当你感到它成了负担时，就把它扔到黑暗的角落里。一个党的思想发展总是需要修正的——把某些东西去掉或不再强调，而把其它东西保留下来。

葛兰西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好例子。诚然，葛兰西是在列宁主义范围内想问题的。在他生活的特定历史环境下他能不这样做吗？但是，与此同时，葛兰西超过了列宁。他的许多概念在列宁著作里是找不到的。我们必须始终具有比例感，不要忘记，在我们继承的东西中，有些部分该发展，而另一些则必须去掉。一个政党的思想和政治转变是长期而复杂的事情。绝对不会在会议上作出决定了事。相反，倒是社会的迂迴曲折的进程起作用。

乌尔班 那些由于实行欧洲共产主义而受损失最大的人——你们的各级领导成员及支持你们的党员——不会要求你们把列宁主义作为党的合

法性的唯一依据而加以坚持吗？

穆西 我并不认为列宁主义是党的合法性的依据。中国党也是一个共产党，但它的历史却明显地不同于苏联党。很难把它列在“列宁主义”项下。就我们自己的干部而言，过去十年中，干部全部换过了。一些最大的党的地方省委会——例如米兰、都灵、威尼斯和波洛尼亚的省委会现在都是由非常年轻的人当领导。米兰的党的书记三十四岁，佛罗伦萨的书记也是三十四岁，威尼斯的书记三十一岁。不仅如此，我们最大、最有影响的省委会——有十万以上成员的省委会——的书记和成员都是二十二、二十五、二十七或二十九岁。我本人就只有二十八岁，现在负责党的《再生》周刊的文化部。关于斯大林主义时期和冷战，我必须从书本中了解或是从老同志那里听到。作为一种个人经历，这些事情对我的意识没有太大的影响，因此，我也不感到受它们的约束。

— 乌尔班 你觉得意大利的共产主义道路——欧洲共产主义——是作为一条替代莫斯科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具有普遍性的道路提出来的吗？根据苏联目前的看法，欧洲共产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一



个发明。苏联这种说法的意思就是，它只差一步就是对共产主义的背叛了。我可以从苏联的这种态度作出如下推断：莫斯科和欧洲共产主义之间不久便可能出现一场论战，其激烈程度可能会同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论战不相上下。

穆西 我可以肯定地说，意大利的共产主义同苏联的共产主义是迥然不同的，但我不能回答你的主要问题，因为这个进程远未完结。迄今为止，我们的政策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只是部分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种新型民主制，那它肯定不仅将成为取代东欧现制度的制度，而且也会成为取代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制度。当然，我们不能希望建设一个同美国、苏联和西德等国社会截然相反的社会。我们的目的应当是建立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它有富于创新精神的号召力，因而能被最大多数的人所接受，而且使我们受到最小程度的攻击。我们现在正在设法做到的就是这一点。

乌尔班 我只能再次强调我的如下怀疑：你们对共产主义的解释会使——其实是已经使得——苏联领导人感到是极其阴险的。再加上贝林格的这样一个信条：贵党认为，得到北约保护

要比站在这个组织外面安全一些，这样你们准备好了被莫斯科诅咒的条件——当然除非欧洲共产主义是一个假象。如果它是一个假象，那么，只要你们以及法共和西共不负所望——西方共产党执政，俄国人就会耐心地忍受你们在意识形态上的过激表现。

穆西 我认为，我们可以说，你的关于欧洲共产主义是一个转移目标的手法的假想是毫无道理的，但我不排除莫斯科采取敌对态度的可能性，其实它也确实这样做了。不过，这也正是我们之所以热烈拥护和平共处主张的原因所在。

乌尔班 但是，根据苏联的解释，和平共处只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意大利可能另当别论，匈牙利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对此知道得很清楚。

穆西 不幸的是，苏联关于和平共处的态度竟然也同美国对和平共处的态度一样（当然是按照亨利·基辛格的解释）。看来，美国人和苏联人一样都不愿意允许在战后分界线的自己那一边有任何一点真正的多中心主义出现。贝林格关于我们站在北约这一边的讲话是现实的。但是，请你记住，除了你引用的他的讲话以外，他还说



过，东欧也许有人不希望我们按照意大利方式建立社会主义，同样，西方也确实有人根本不希望我们以任何方式建立社会主义。

总而言之，我们的目的是要使人对一种样板社会有所了解。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这种社会都能医治二十世纪末叶的许多弊病，而不会侵犯美国和苏联的切身利益，也就是说，不会改变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存在的力量对比。要求得更多是愚蠢的；要求得更少则会使我们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利。

· 乌尔班：现代史作家，前南加利福尼亚大学高级副研究员和印第安纳大学研究员。一九四七年毕业于布达佩斯大学，一九五六年伦敦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〇年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五年任自由欧洲电台对大学广播部主任。作为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国际关系学院高级副研究员，他创办了《比较共产主义研究》季刊。他现任自由欧洲电台顾问，著作有《十九天》（一九五七年出版）、《中苏冲突》（与利奥波德·拉贝兹合写，一九六五年出版）、《缓和》（一九七六年出版）等。

法比奥·穆西：意大利共产党文化部《再生》周刊主编。